

全球高校网络展望

Robin Middlehurst

英国金斯顿大学 (Kingston University) 教授

电子邮箱: r.middlehurst@kingston.ac.uk

几个世纪以来, 高等教育一直是提供国际交流联系的平台, 学者们从中交流思想、获取新知识。然而, 目前这种联系似乎达到了新的高度; 毫无疑问, 进行实体和虚拟联系的技术能力是其助力之一, 但也还有别的原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的克里斯·奥尔兹 (Kris Olds) 探讨了“似乎无穷无尽的协会、网络、联合会和联盟”, 他表示,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去国家化的进程——高校在国家范围之外重新定义它们的形象、结构与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一项针对 19 世纪后期到 21 世纪早期国际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研究发现, 那些试图让高校国际化“去国家化”的办法通常都以失败告终 (或持续不久)。那么, 在全球高校网络仍在扩张的同时, 高校向国界之外发展的各种努力为何注定失败呢?

世界大学网络 (Worldwide University Network) 的学者开展了横跨欧洲、亚洲、澳洲以及南北美洲的历史性合作研究。研究认为国际联合会与网络的发展其实是对高等教育中重大历史结构变革的一种反应。许多大学联合力量, 希望在“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内满足新的期望并解决问题。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入学人数和科研经费随经济繁荣与萧条而不断波动; 促进学生、学者及知识本身三者之间学术流动的传输交流新途径不断发展; 对于应用科学、专业技术和商业创新的

需求不断增加; 以及意识形态随着制度变化而发生重构。作为建立全球高校网络的驱动要因素, 这些挑战仍然存在, 不过如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

竞争压力鼓励高校和国家通过合作来寻找竞争优势。人们对“世界级声誉”与“世界级水平”的渴求推动了排名、定位、品牌以及声誉管理。在全球性媒体的势力与影响力无处不在的 21 世纪, 在新兴社交与移动技术的支持与扩展下, 上述驱动因素也许比以往更强。与那些成绩斐然、资源充裕或是声名卓著的高校往来可能会带来附加价值, 这些附加价值不但有实质性的益处, 也有间接带来的荣耀。被邀请加入一个专属的高校网络 (如“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和“21 校联盟” [Universitas 21]) 标志着相互认可, 也标志着参与院校的质量在全球学术研究等级体系中有目共睹。对于其他那些还在寻找全球合作伙伴的高校, 想要在拥挤的高校网络市场中显示出差异性和独特性, “探究性研究” (scholarship of discovery, 即传统学术) 之外的因素也相当重要。

全球网络的多样性

全球高校网络不只是在高校间蔓延, 这些网络跨越各个行业以发展新的合作伙伴, 它们利用合伙资产为企业、个人和高校谋求利益。三螺旋 (Triple helix) 创新体系是将传

统上分隔的创新源联合在一起的例子之一（创新源指产业的产品研发、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学术界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其目的是促进新组织设计、新知识、新产品以及新服务的发展。丹麦与瑞典之间新建立的跨海大桥促成了厄尔松大学网络（Oresund University Network）的建立，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新的教育机会。然而，最初有11所大学的高校网络如今已缩小，留下的仅是那些能够从网络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大学。利用长期以来的友好城市关系，英国伯明翰市与美国芝加哥市之间建立了新形式的文化交流，包含博物馆、剧院、美术馆及大学间的多种联系。企业也带头建立高校网络：桑坦德银行（Santander Bank）建立了“桑坦德银行全球大学部”（Santander Global Universities Division）以资助高等教育，称高等教育为“为社会发展繁荣做出贡献的一种方法”。如今，桑坦德银行已为17个国家1000所成员大学的发展研究、人员流动和奖学金提供资金。国际组织也促进了全球高校网络的发展，以此来汇集资源、解决紧迫挑战、推动社会发展。“联合大学网络”（Unitwin Networks）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UNESCO Chair）——一个包含24个国家650所高校的项目，“是学术界、民间团体、当地社区、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智囊与桥梁缔造者”。

多重主题

高校在全球网络中进行多主题的合并或合作，从而交换信息并交流好的实践经验，衡量其活动，通过科研和联合学位项目创造新知识，促进教职工与学生的流动性，优化与扩充资源配置，推动并宣传服务与价值观。主题类的高校网络包括：“欧洲首都高校联盟”（UNICA，包含35个欧洲首都城市的46

所大学）、“北极大学”（UArctic，合作高校联盟，包含与北极教育和研究相关的10个国家的大学、学院、研究机构及其他组织）、“欧洲应用科技大学网络”（UASNet，包含9个国家的应用科技大学，由其全国大学校长作为会议代表），以及专注于远程教育的“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sian Association of Open Universities）。共同的价值观也推动着全球高校网络的发展。“塔乐礼高校网络”（Tallore Network）中的成员来自72个国家的320所大学，它致力于加强高等教育的公民角色与社会责任；“国际可持续校园联盟”（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Campus Network）有67所成员高校，遍布五大洲，致力于校园运营、科研及教学的可持续性；“风险学者网络”（Scholars at Risk Network）的高校、学术组织和相关联盟都倡议保护学术自由、高校自治，以及相关高等教育的价值观。

可持续性

当前部分全球高校联盟是新的：一些联盟已存在数十年；一些经历了重组（如“厄尔松大学网络”[Oresund Network]）；而另一些则已消失（如“苏格兰知识协会”[Scottish Knowledge]，一个跨11国的在线学习联盟）。过去的经验为高校联盟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线索，给我们的启示是：忽略或轻视文化、政治或智力的差异——尤其是错误地认为追求新的国际联系就是削弱了国家关系——必定导致失败。更为深刻的启示是，只要维持信任、努力以及高校资源的流动得以维持，每个成员必能从高校网络中获益。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高效管理跨越国际边界的高校关系，很可能成为维持全球高校网络的核心能力。